



孟子何忧

□ 陈方刘 朱志敏



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而孟子一生周游列国，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精神辨异端、辟邪说，弘扬儒家之道，甚至在不得志的情况下仍然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诚可谓“不忧不惧”、非常自信，然“不忧不惧”的孟子在其言辞之中始终蕴含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孟子究竟何忧？

忧天下苍生困苦

孟子不是忧自己，而是忧天下苍生。他对齐宣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并进而向齐宣王建议“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悲天悯人，自己也始终心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之思。

孟子生活于战国时期，看到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十分忧虑。他并不一概反对所有的战争，认为如果是拯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正义之战，民必将“单食壶浆，以迎王师”，但他深刻指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并对当时的不义之战进行了激烈地抨击，认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除此之外，他还主张省刑罚、薄赋敛，反对多重征税，严厉谴责统治阶层对平民百姓的横征暴敛。孟子指出当时“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认为“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孟子这种“忧天下苍生困苦”的崇高情怀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

体现，对后世影响很大。杜甫讲：“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种忧患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忧诸侯仁政不施

梁惠王曾问孟子，自己尽心治国，老百姓遇到灾荒尽力救济，但是为什么“邻国之民不不加少，寡人之民不不加多”？孟子对梁惠王之问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回答，把对天下苍生困苦的忧虑深化到对诸侯仁政不施的忧虑。

孟子并不否认天下苍生困苦有自然原因，并提出“不违农时”的宝贵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但他更主要分析了天下苍生困苦的社会原因，那就是诸侯仁政不施。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意思是说统治阶层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棚里有壮实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如同率领着野兽来吃人！这段犀利的斥责话语体现了孟子对统治阶层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愤慨。他进而劝梁惠王“施仁政于民”，通过施仁政而得民心，孟子曾比喻说，民归仁如水就下，尧舜之所以平定天下是通过施仁政，因为“仁者无敌”。

因此，要解民于倒悬，必须要实现天下一统，但这种一统是基于儒家“仁政”思想基础上的一统，而不是靠武力战争，因为如果通过武力战争实现一统，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这是对孔子倡导“仁政”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孟子明确提出：“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认为只有施行仁政才能赢得民心，从而实现天下一统，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忧儒家道统不传

儒家历来有“忧道不忧贫”的传统，孟子将对天下苍生困苦和诸侯仁政不施的忧虑进一步上升到对儒家道统不传的忧虑。时人有问孟子为何好辩，孟子说不是自己好辩，只是因为不得已，因为当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认为杨朱追求私利而“无君”，墨翟兼爱而“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为了捍卫和弘扬儒家道统，孟子对杨朱、墨翟之言进行激烈地批判，不仅传承和弘扬了儒家道统，也强化了儒家的道统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孟子在儒家道统中一直居于很高的地位，韩愈赞其“功不在禹下”，被后世尊称为“亚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了弘扬儒家道统，孟子认为，当官为政之人需要加强道德修养，不能为衣食俸禄而失去独立人格，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更不能助纣为虐，这也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使然。但当时“士”风败坏，很多所谓的“士大夫”不是劝导诸侯施仁政而是鼓动他们行霸道，不是纠正诸侯的恶行而是游说他们攻城略地。孟子说他们：

“君不乡道，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他认为这样的“士大夫”是“民贼”，真正的“士大夫”应该是“君子”，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这里的“君子之忧”又是何忧呢？就是忧自己成为庸庸碌碌的常人，甚至堕落为助纣为虐的小人，而不能成为像尧舜那样修身立德而有功于天下的圣人君子。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孟子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人。他不仅主张君子应该加强道德修养，弘扬儒家道统，而且自己也是一生坚守“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即使不能“达则兼济天下”，也要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孟子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周游列国，不畏艰险，积极宣扬儒家之道，最后虽然不为诸侯所用，但退而著书立学，在“立言”中实现人生的不朽。这充分体现孟子的忧患意识没有丝毫畏惧退缩之意，而尽显乐观进取之志，也说明了孟子为什么既具有“忧患意识”，但他自己又对仁政的弘扬、道统的传承“不忧不惧”。

2000多年来，孟子的忧患意识一直为后世所推崇称道，推动中国较早形成“以德治国”的政治传统，也推动中华民族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尤其那种为了捍卫和弘扬儒家道统“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篇中，用气势恢宏的排比句历数了历史上无数往圣先贤于忧患中奋起的事实，提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最后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一千古名言作结，无数次警醒中华民族在遇到危局时转危为安，激励后世仁人志士在陷入困境中自强不息。

粮食的芳香

□ 王吴军

风越来越爽利，天空越来越高远，田野里的庄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成熟，变得沉甸甸的。秋日的气息越来越浓，清晨和夜晚已经有了袭人的凉意，这种凉意伴随着庄稼成熟的气息弥漫在天空之下的万物之间。顾不上休息的父老乡亲，每天早早地就出了村，在田野上收割庄稼，努力把每一粒粮食都收回来，尽管辛苦，一说起庄稼的成熟，他们脸上都会露出笑容。

庄稼收割完之后，田野里平静下来。此刻，凉意越来越深，天气不知不觉变成了清寒。北风渐起，夜半时分经过村庄，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父亲和母亲终于可以在家里歇息一下了，但是，即使在家里，他们也并不闲着。在我家的堂屋里，他们围坐在一起，不停地剥着花生，颗粒饱满的花生被挑选出来，在明年春天播种花生时做种子。在乡村里，只要勤快就会有做不完的事情。只有在阳光明媚的上午，父亲才会扛起他那用了多年的铁锨、抓钩和锄头去菜地里，把地

收拾收拾，往地里撒种一些茼蒿、菠菜、白菜的种子，或者坐在太阳地里剥玉米。记得小时候在星期天，我的作业写完了，父亲会带着我到村子南头的沙岗上割那些干草回家沤起来，第二年就是很好的农家肥。这些事情，都是在不急不躁、悠然从容中做的。庄稼收完了，麦子也种上了，地里已经没有什么火急火燎的事情了。

这时的村庄是悠闲的，也是静谧的。

是的，庄稼已经收到了家里，粮食已经颗粒归仓，这是一年中粮仓最丰满的时候，也是一户人家离富足最接近的时候，看着成堆的粮食，让人无比满足，现在终于从忙碌的劳动中暂时停歇了下来，可以好好享受那些收获的粮食了。父亲和母亲把粮食看得非常珍贵，即使收获了许多粮食，他们依旧不肯浪费一颗一粒。吃饭的时候，父母亲从不会随意倒掉没吃完的饭菜，也不允许我们兄弟几个浪费食物。从一个米粒和一点残渣，到一粒玉米和一块红薯，从一颗花生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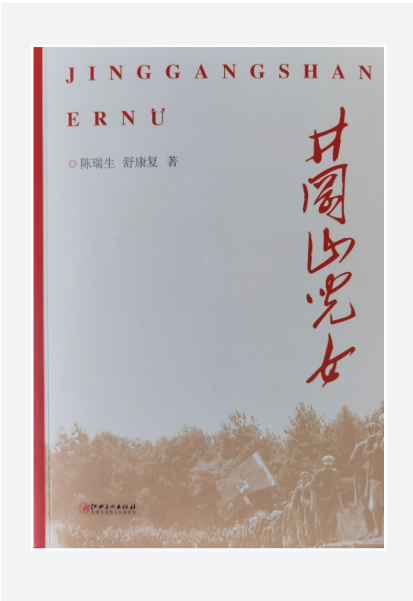
一穗高粱，到一粒芝麻和一根萝卜，他们都格外珍惜。

《诗经·周颂·丰年》中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秬。”意思就是说，丰收之年，小米和稻子都收获了，高大的粮仓千千万万。五谷丰登，年年有余，这是庄稼人最单纯最美好的心愿。古人讲：“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一颗秋实中，都饱含了农人太多的期盼和汗水，自然无比珍惜。农家小院内，亲情满满的一家人，三餐能够温饱，四季总有欢笑，生活朴素、平淡却浸满幸福。

俗话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也是动手储藏的季节。天气一冷，父亲就带着哥哥和我扛着铁锨来到我家屋后的空地里，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下雨时不会积水）选位置挖土坑。松软的土壤让我们没有费很大的劲儿，就挖出了一米多深。我们把土坑挖成长方形，把土坑的底面和里面四周也弄得平平整整的，一个红薯窖就挖好了。拉来一些捆好了的干燥的玉米秸秆和一些木棍，我们把已经晾了

十几天的红薯、芋头放进窖里，把木棍架在上面，再用玉米秸秆把上面盖好。这样，这些红薯和芋头就可以在红薯窖里度过一个温度适宜而又无比干爽的天了。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红薯窖里贮藏的红薯和芋头吃完了，我们把上面的木棍和玉米秸秆拉回家，然后把挖出来的泥土进行回填、踏实，这个红薯窖就算彻底完成了“冬藏”的使命。

耕耘、播种、收获，贮藏、惜食。我故乡村庄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度过的，丰盈而舒缓，踏实而朴素，就像白天的太阳，也像夜晚的月亮，更像田野里的庄稼，沉静、生动，有热烈、也有安详，有忙碌、也有闲适，有苦有甜、有滋有味，充满了土地的气息，也充满了粮食的芳香。



2021年5月，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前夕，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陈瑞生教授和一级编剧舒康复执笔的长篇小说《井冈山儿女》。这部小说从一个12岁孩子的视角，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经走过的一段艰难历程。

小说主人公苏小虎的父亲苏志海是红军师长。因为小虎不满13岁，在红军长征前夕被留在苏区赣中红石村，由村民红莲和她的丈夫钟大柱领养。在红石村，和虎子一起被老表们领养的红军子女还有“小广东”、秀秀、彩霞等孩子。同时，在红石村后山的山洞里还隐藏着许多红军的伤病员。故事就围绕着这些孩子和伤病员的安危展开。红石村的老表们在中共地下党联络人钟亮和红军游击队的帮助下，与红石村恶霸地主、国民党军、民团和土匪斗智斗勇，不但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伤病员、使他们重新归队的重任，而且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女一样抚养和保护了红军留下的孩子，让他们安全成长。抗日战争开始后，苏小虎跟着钟亮叔叔到达延安，与父母重逢，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老百姓是淳朴而善良的，是非善恶在他们心中自有权衡。红军在红石村打土豪分田地，灭地主老财、团丁、土匪的威风，长贫苦老表们的志气，红军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红军免费给老表们治伤、帮助老表们干活种地，红军纪律严明……红军

的所作所为，使老表们深知，共产党、红军和他们才是一家人。在灾难临头之时，他们的选择既出自大义，也出自本能。

在那种缺吃少穿、敌强我弱、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下，领养红军的孩子，不但多了吃饭的嘴、增加了生活负担，而且要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冒着杀头的危险。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只给了每个领养红军孩子的老表家三块银元抚养费。但红石村的老表们心甘情愿接下红军那三块银元，甚至一块银元都不要，就把红军的孩子领回自己家抚养。正如小虎的养母红莲阿妈所说：“红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恩人有什么难处，我们老表以命相换也值得。”

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斩草除根，在县城贴出告示，抓到一个红军就赏500大洋。对国民党的重赏，红石村的老表们丝毫不为所动。但是，恶霸地主王继业和他的走狗民团团长赖德安为了得到国民党的奖赏，却更加疯狂地搜捕红军崽，并设下圈套，逼迫红莲在亲外甥阿牛和苏小虎之间作出选择。生死关头，红莲为了保护虎子和更多红军孩子的生命，选择第一时间救回虎子，而亲外甥阿牛则被抓进县城的监狱，受尽折磨才被钟亮等人救回。生动感人的故事反映了井冈山儿女与共产党、红军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反映了苏区人民对党和红军的支持和热爱，揭示了“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真谛。

这是历史的真实！当年不少红军高级干部都把自己的亲生骨肉留在老表们家中，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和陈慧清夫妇、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务主任罗明和谢小梅夫妇……有些孩子尚在襁褓之中。

小说主创陈瑞生教授与小说主人公苏小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也是老红军的后代，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刚刚一岁，就被寄养在老家乡中，由养父母抚养长大。直到1949年江西解放，16岁的他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陈瑞生曾经说过，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但在退休之前，他一直在中央党校从事哲学教学和行政管理

传承红色基因的一部生动文学读本

——评长篇小说《井冈山儿女》
□ 谢武军

理想付诸实践，接连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先后有《风雨少年》《井冈山的红杜鹃——我的母亲彭儒》《难忘的非常岁月》三部纪实文学作品问世。其中，《风雨少年》已经被改编成电视剧《井冈山儿女》，尚待播出。

小说《井冈山儿女》是依据同名电视剧剧本改编而成的，是它的姊妹篇。协助陈瑞生完成改编工作的舒康复是电视剧剧本的责任编辑。这部小说是一部非纪实性文学作品。非纪实不等于不真实，它源自生活而高于生活。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苏小虎的机灵、阿牛的憨厚、红莲阿妈的心灵手巧和深明大义、钟亮叔叔的机智勇敢和沉着冷静、钟阿公的老成持重和深孚众望、王继业等反面人物的心狠手辣和贪得无厌，都被描写得栩栩如生。小说通过“我”（苏小虎）亲身经历的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阶级斗争的残酷，人民生活的艰辛，也反映了江西老表多方面的生活。比如农村少年放牛、养鸡鸭、采野菜、挖葛根的劳作，以及他们投掷布包石、打弹弓、上树采野果子、下河摸鱼的乐趣；江西客家人集体在祠堂过小年的习俗，点孔明灯、烧宝塔等民俗活动，既真实可信，又富有生活气息。

小说的这些特点突显了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的优势。但是一个12岁孩子的亲身经历毕竟有限，因而对历史背景和故事背后原因的叙述就显得有些欠缺，有的叙述和用语超出了

一个农村少年的视野和理解力。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陈瑞生这样表达他的创作动因：“这段历史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不啻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又一个活教材。”“我已耄耋之年，再不出来说，这段历史说不定会永远地被淹没。”于是，他在助手舒康复的协助下，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是赓续红色基因，弘扬井冈山精神的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读本。

《井冈山儿女》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只要我们永远保持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本色，我们就能无往不胜。